

父亲因车祸受重伤无钱医治难忍痛楚,儿子将其勒死称帮父解脱—— “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”

□据 人民网

年近七旬的徐世扩死了,而杀死他的,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徐永贵。

法庭上,徐永贵陈述,几个月来,自己日夜照顾因车祸受伤的父亲,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出事当天,父亲多次求他用麻绳勒死自己,帮他解除痛苦。在父亲一再哀求下,他犯下大错。

面对久病的父亲,做儿子的是于心不忍,希望助其早日结束痛苦,还是瞬间人性恶的一面占了上风,因不堪承受长久的经济与精神压力,对父亲痛下杀手?



法庭上的徐永贵。(资料图片)

1 “绳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,我看到他笑了”

看守所里,坐在记者面前的徐永贵是个看上去身高不足1.7米的男人,他佝偻着背,目光有些呆滞,与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。徐永贵一边抽泣着,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向记者讲述出事时的情形。

那是2010年5月13日的晚上,距离父亲徐世扩因车祸受伤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月。徐永贵记得,那晚,父亲不停地用手撕扯被子,嘴里喊着:“疼啊,疼啊。”他时而使劲地挪动身体,用头撞墙。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,他哭着哀

求儿子:“快找一根绳子帮我解脱吧!”

徐永贵回忆,看到父亲如此痛苦,他一边流泪,一边宽慰父亲:“你好好养着,我会打工挣钱给你治好的。”他把这句话说了很多遍。

“后来,父亲又哭又骂,说我不孝顺,他疼得受不了,一直让我帮他解脱。”徐永贵说。

父子俩“死还是活”的交锋一直持续到早上6点左右。徐永贵的每一句劝说,引来的都是父亲更大的怒火。父亲的唯一理由,就是“与

其那么痛苦,不如让我去死”。

徐永贵渐渐觉得被父亲说动了。最终,他解下墙上挂毛巾的一根编织绳,朝父亲的脖子勒去。

“绳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,我看到他笑了。”向记者讲述时,默默抽泣的徐永贵抬起头,微微张开嘴唇,咧着嘴,露出5颗牙齿,学着父亲那一瞬间笑的样子,随即抱着头,哭喊着说:“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脑子里,忘不掉,一辈子也忘不掉。”

2 每月打工挣50元,给家里40元,剩下10元作送钱的来回路费

徐永贵回忆,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发生在2010年1月22日。

那天,在北京打工的徐永贵刚刚回到贵州,准备跟家人一起过年。早上6点多,他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,说父亲发生严重车祸,正在抢救。

赶到医院,医生告诉徐永贵,他父亲的双腿骨折了,可能还有神经损伤。

医护人员赶到车祸现场时,肇事司机已经逃逸。

徐永贵到交警部门查看事发地段的监控录像,却被告知监控器当时是坏的。

在医院刚住了一个星期,徐永贵就为父亲花了1万多元的医药费。医生告诉他,要治好父亲的腿,就要进行手术。第一期的手术费大约8万元,其后可能还要接受多次手术。

找不到肇事司机,父亲和继母又没有经济收入,仅第一期手术需要的8万元,对于徐永贵而言,已经无异于天文数字。

今年32岁的徐永贵少言寡语。

因为家庭条件差,从小到大,徐永贵都是同龄孩子中最受气的一个。

1994年小学毕业后,徐永贵放弃了学业。在省城贵阳,他在一家小餐馆里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,待遇是每月50元工资,包吃包住。

每个月发工资那天,是徐永贵最高兴的日子。他总会花3块多钱,坐长途汽车回到老家平坝县龙山村,给家里留下40块钱,再花3块多钱坐车回贵阳。

“母亲每次拿到40块钱都会很高兴,还会背着我悄悄掉眼泪。”徐永贵说,每当那时,他有一种孝敬了父母的感觉,心里很舒服。

2000年,徐永贵的母亲去世了。

2003年,徐永贵的父亲在贵阳再婚,并和继母在贵阳租房居住。

看到父亲又找了一个伴,家里的日子慢慢稳定下来,徐永贵想去其他地方试试。2008年,他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

在北京,徐永贵找到的工作是保健品推销,每天的任务就是穿着体面的衣服,向药店和个人推销维生素片之类的产品。

在北京的两年间,徐永贵依然没有间断每月给父亲寄生活费,在他看来,没有女朋友,父亲是自己唯一的牵挂。

两年的保健品推销也让徐永贵觉得找到了方向。“我已经和贵阳的几家药房谈好了,应该能挣到钱,会越做越大。”他悄悄规划着,在挣到第一桶金之后,开自己的公司,做属于自己的生意。

3 “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”

然而,那场从天而降的车祸,打乱了徐永贵的所有计划。

“在大医院交不起钱,肯定治不好,只有找‘乡土医生’治,还有一线治好的希望。”住院一周后,徐永贵把父亲背回了出租屋。

从2010年1月22日出车祸,到2010年5月初,徐永贵说,自己不是在床边照顾父亲,就是在寻医问药的路上。但凡能打听到的民间名医,无论多远,他都会去找。

北京的工作辞了,保健品生意停了,徐永贵说,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。

虽然求医问药花了4万多元,但父亲的情况似乎每况愈下。

每天,父亲都在病痛中呻吟,每次看到父亲用无力的双手抓被子、打墙,用头撞墙时,徐永贵只能死死地抓住他。

徐永贵说,伺候父亲小便时,会给他包上尿不湿,尿完后再用热水给他擦洗干净。因为伤及下肢和神经,父亲没有足够的力量排出大便,徐永贵就用手指,套上塑料袋,一点一点地帮父亲抠出大便,再用热水擦洗干净。

“他爱喝水,小便一天差不多10次,大便

一天要拉两三次。”徐永贵说,“有时候自己一天睡不到一个小时,但从没想过放弃,因为他是我的爸爸。”

在贵阳市区的一个城中村,徐永贵找了一间每月租金180元的平房。这间平房跟其他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小院,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。房间的墙壁上泛着点点霉斑,白天如果不开灯的话,看报纸都困难。

“再苦我也要撑下去,不然我父亲的病就没希望了。”徐永贵说。

4 “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”

2010年5月13日下午,徐永贵和姐夫一起,用板车推着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,来到了这间新租的平房,路上,父亲要吃雪糕,徐永贵花1块钱买了一支“娃娃头”。

徐永贵记得很清楚,父亲被抬进新租的平房时,第一句话是:“这个地方太黑了。”

尽管对环境有点失望,父亲还是一直对儿子念叨着:“拖累你了……看你30多岁了,家也成不了,都是我害的……”

“自己家人,还说那样拖累嘛。”每当听到父亲念叨这样的话时,徐永贵都会不舒服,在他的观念里,姐姐嫁人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,照顾父亲应该是儿子分内的事。

邻居孔庆英回忆,当天搬来的时候,徐家没有跟邻居多说什么,继母用带来的电磁炉做了一顿晚饭,还在小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洗了白菜。

徐永贵回忆,当天晚上,父亲特别烦躁,一会儿说要喝水,一会儿说要小便,徐永贵把水端到他身边时,他又摇头不喝,还把递到手边的尿壶扔飞了。

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,徐永贵亲手勒死了父亲。看到父亲断了气,徐永贵突然觉得害怕了起来。“我不能想象,今后生活中没有父亲是什么样子的。”恐惧之中,他想了打120。

孔庆英记得,那天早上出门生炉子,路过徐家门口时,徐永贵站在门口,直着眼睛,对着这个陌生人说了一句:“糟了,我爸爸喊不答应了,打了120。”

之后,孔庆英看到徐永贵进进出出了好几趟,十几分钟后,120急救车到了。徐永贵说:“那时父亲已经活不过来了,看到我父亲脖子上有勒的痕迹,医生就让我报警。”

打了110后,徐永贵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杀人的大罪,他把绳子的一头吊在父亲的脖子上,另一头绑在高低床的床头,徐永贵说,当时想营造一个自杀的场景,不想被枪毙。

今年2月21日,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徐永贵涉嫌故意杀人案。据媒体报道,在庭审现场,徐永贵哭红了眼,作最后陈述时,他含泪站起:“父亲太痛苦了,我真想帮他‘解脱’……重病后,也四处借钱给父亲治病,照顾父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,一时头脑发晕,答应了父亲的要求,犯下了滔天大罪……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。”

听着徐永贵带着哭腔的陈述,旁听席上一片静默。

在庭审即将结束时,徐永贵的姐姐徐永琼忽然跪在了法庭的正前方,痛哭着为弟弟向法官求情。她说,徐永贵是个孝顺儿子,他这样做只是不想父亲再受痛苦,希望法院从轻判决。此时,被告席上的徐永贵深深低着头失声痛哭。

在法庭辩论阶段,检方认为徐永贵如实供述犯罪事实,并深感悔恨,鉴于他打工赡养父亲,给父亲治疗,照顾父亲,尽到了赡养义务,具有一定从轻量刑情节,希望法庭根据相关法律作出从轻处理。

现在,徐永贵正在等待法院的一审判决,在看守所里,他每天都会看刑法。他说,即使有机会改过自新,父亲咽气前的样子也会成为永远的阴影,“一直在我脑子里,一辈子也忘不掉”。